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二六期 ——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12a)

| | | |
|--------|--------------------|---------|
| 【回首文革】 | 有关田家英的若干史料辨正 | 阎长贵 |
| 【亲历者言】 | 我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 艾 玲·洪小文 |
| 【当事者说】 | 九一三事件中的直升机现场 | 胡世寿·舒 云 |
| 【文革一页】 | 文革时期闻名全国的灵宝县“精兵简政” | 石 耘 |
| 【史海钩沉】 | 江青借纪录片《中国》挑起政治风波 | 丁 东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回首文革】

有关田家英的若干史料辨正

• 阎长贵 •

田家英是“文革”还未全面开始时自杀的高级干部，他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标志“文革”全面发动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通过第一个“文革”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的会议）还未结束时就自杀了（23日）。众所周知，田家英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特别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他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因此，他的自杀是震惊全党的大事。

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是怎样自杀的？迄今45年过去了，这件事仿佛还未取得完全的共识。而真正厘清这件事，对了解“文革”乃至高层政治都是十分重要的。

◇ 是毛泽东秘书，也是毛的忘年交

田家英1922年1月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3岁丧父，9岁丧母，11岁被迫辍学，在哥嫂开的中药铺做学徒。田家英生性喜爱读书，在辍学的日子里，靠着一本字典通读

了《资治通鉴》、《史记》和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他性格倔强，不甘听凭命运摆布。他的床头挂着一副对联，“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1935年，田家英13岁时，就在报刊不断发表诗歌和文章，在川中被称为“神童”。“田家英”这个名字就是他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

田家英在中学读书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与同学经常到街头茶馆宣讲抗日、散发传单，还参加了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因此被学校开除。1937年11月下旬，田家英和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告别故乡，踏上了去延安的路。12月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田家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田家英相继在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等单位工作。1941年至1943年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奴才的见解》、《从侯方域说起》等文章。《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特别赞赏，虽说那只是千余字的杂文，但从中可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思想。文笔如此老辣深沉的作者竟是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这让毛泽东颇为感慨。自那以后毛便注意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

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国外，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教他历史、语文。这时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了田家英——田熟悉文史，又与毛岸英同庚。就这样，田家英当起了毛岸英的老师，与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

1940年代的最后几年，国共两党大决战的时刻，也是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异常繁忙，需要增加新秘书。1948年8月，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26岁的田家英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深得毛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身边工作，更是深受熏陶与感染——两人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了忘年交。

毛泽东有夜里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努力适应毛泽东，与他同步工作。1961年11月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准备睡觉，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作者、出处等。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这让毛泽东非常高兴。毛经常让田家英做这类事情，他都做得很好，满足了应急之需。

这里顺便说一件事情。近年网上传播一个说法——1995年6月，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的书面报告，该报告称：“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160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别人）起草的。”必须郑重指出，这个所谓报告及其内容完全是谎言。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写文章是不让别人代笔的。无数事实证明，毛泽东不仅会写文章，而且是大手笔。他自己在1964年一次中央会议上就明确说过：“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我病了，就是我说别人记的……”毛泽东不仅自己这样，也希望和要求其他领导干部这样。当然也有例外——例外之一，就是八大的开幕词是别人替他起草的。八大会议上，毛泽东所致开幕词，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多次被掌声打断，会议中间休息时，许多人还对开幕词啧啧称赞。毛泽东不掠人之美，坦然地告

诉大家：“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的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八大开幕词中有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田家英起草八大开幕词的得意之笔，也是毛泽东十分满意的一句话。这句话，必将和古人说的“满招损，谦受益”一样成为不朽的格言。

特别需要指出，田家英为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立下了很大功劳。他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的全部编辑工作，还主持编辑供广大青年和一般干部学习使用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同时，协助毛泽东编辑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毛选第一卷至第三卷的注释，是田家英主持撰写的，其中一部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和定稿。四卷《毛泽东选集》出版以后，田家英和其他同志发现注释中有不少疏漏和不确的地方，从1962年起，他主持第一卷至第三卷注释的修订工作。田家英发表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宣传和介绍毛泽东著作的。可以说，他把一生中最主要的精力倾注在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研究和宣传上，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田家英经历过长期的革命锻炼，是很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在思想品质上，他诚实、正派、有骨气，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敢于向毛泽东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对重大政策的制定和修改也敢于提出自己的建议。田家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 自杀之谜：当事人的回忆

但这样一位好干部为什么在“文革”还未全面开始时就自杀了呢？这个问题应该述说清楚，否则就成了历史上的永久之谜。众所周知，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很多，而影响最大、最值得重视的恐怕是胡乔木的说法。我不揣疏漏和冒昧，大着胆子就以胡乔木的说法为例谈谈此问题。

最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丁晓平著《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一些报刊不断选载和介绍，被称为是一部“评价公允”、“真实可信的优秀传记作品”。该书关于田家英之死的情况叙述如下（转引自8月12日《作家文摘》）：

被加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罪状的田家英（指在整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的谈话时，田家英主张删去“《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词句——笔者注），早在1962年就被江青第一个戴上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这次又得罪了江青，厄运终于降临。1966年5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来到田家英在中南海喜福堂的家中，宣布罪状，停职反省，逼迫其限时限刻搬出中南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田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痛苦地在5月23日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丁晓平的书认为迫害田家英致死的首要责任人是江青，具体执行者是王力、戚本禹，他们到田家英家中，宣布田家英罪状，要他停职反省，逼他搬出中南海，他因忍受不了这种屈辱才自杀。当然，作者是沿用胡乔木的说法，但事情果真如胡乔木所说的这样吗？江青对田家英之死无疑有责任，不过我没掌握确实材料，没法具体说明；但说到直接导致这一悲剧的王力、戚本禹，他们对这件事情都有详尽的说明——若不因人废言，从“法律”上讲，也应该听听“被告”一方的意见。这里顺便说一下，胡乔木说王力、戚本禹1966年5月22日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准确，因为中央是1966年5月28日才发布通知宣告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

下面，先看看2001年出版的《王力反思录》中关于田家英之死问题的说法：

（一）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检查以后，会上讨论对四个人的处理。罗瑞卿不在这个会上处理，由军委处理。大约是2

0日，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组（那时不叫专案组）处理彭、陆、杨、田（家英）的问题，总的组长是周恩来，下分四个分组，彭、陆、杨、田各一个分组。彭组由周恩来自己负责，陆组陈伯达负责，杨组康生负责，田组安子文负责。

（二）安子文分组的成员是我和戚本禹。21日或22日，安子文突然打电话通知我和戚本禹到他家里去，坐他的车到田家英家里，怎么谈事先没商量，是安子文一个人谈的，我和戚本禹都没说话。我认为安谈的还是相当缓和的，不是那么气势汹汹。安对田说：“中央认为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不适宜担任现在的工作了，暂时由戚本禹负责。中央要你马上把有关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编进毛选的原稿、印的东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来。”这当然实际是撤职，这是毛主席决定的，少奇、总理都不能决定。

（三）23日继续开会，就在这个会上，汪东兴接了个电话后很紧张地跑到主席台上跟总理说，田家英自杀了。总理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赶到田家，这时田家英已经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务员打发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他自己倒锁了门自杀。等公务员回来敲不开门，最后报告中办把门撬开，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去时已死了很久。安子文光叹气，有话可以向组织上说嘛！我和田家英是朋友，私交很好，在文物方面有交往，我觉他死得很可惜。戚本禹也吓呆了。戚本禹对田家英一直很好，戚被打成右派，是毛主席让田家英解放他的，而且把他调到要害部门工作，田家英是他最大的恩人。戚对田家英的旧情还是有的。总之当时对田家英之死都感到惋惜。

（四）田死后当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边（田家英的夫人——编者注），到中央组织部谈田家英死的经过。董边说，头天夜里田家英说了一句话：“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她说，她当时没有注意这句话，没有向组织汇报。7月份江青回京前，我们就听到传达江青的话，说陈伯达、康生（实际上是说周恩来）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让田家英自杀了？江青回来后又骂了好几次，说对田家英处理不果断，早就该隔离。她是把田家英当成敌我矛盾了。

（五）田家英之死的经过就是这样。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刊载胡乔木的文章，说“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五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田家英迁出中南海，田忍受不了这种污蔑和侮辱，不得不含冤去世。”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事实。

再看看戚本禹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戚本禹2002年写了《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一文，着重批驳“荒诞无稽的流言”。同时，该文也说明了田家英之死的情况：

（一）1966年5月21（22？）日上午，安子文电话通知我：下午二时半，去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戚本禹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在党内威信很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力虽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安部长的话唯命是从。于是，我俩上了他的车，一起去中南海。当时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到达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似乎有点紧张，说：“家英同逢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坐等。果然一会儿田家英和逢先知回来了，一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他坐下，又叫董边和逢先知也坐下，然后安详地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戚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反省不要出去了。”这以后，田家英问安子

文，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不像书刊上说的一派训斥口吻。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但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更没有当场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的表现是无奈和委屈，不像书刊上说的那样激动，更没听他说一句怨恨毛泽东的话。固然，按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和我以及董边和逢先知都没说什么话。

（二）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逢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这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三）深夜电话事件后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八九点，田家英吩咐他的勤务员小陈出去买香烟和其它东西，自己则走进永福堂西厢，即毛泽东的藏书室，锁了门，然后把头悬在一根拴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自尽了。约十时许，小陈从西单回来，发现田家英自杀，他惊恐地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八司马”之一的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我和汪东兴等报告，我们立即报告会议主持人。接着安子文、王力、汪东兴等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董边很悲伤，但她没能赶过来。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当时到现场的人，无论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中央领导人，谁都没有发现他身上有枪伤，也没有在毛泽东的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发现任何血迹。当时所有到场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该这样，没有人幸灾乐祸的。

除了上述内容，戚本禹一次和我通电话谈到胡乔木关于田家英之死问题的说法时，愤怒地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戚还说，我对有些人很鄙视，很看不起。他们在揭发田家英时，捕风捉影，任意夸大，无限上纲上线，材料写了一大摞，把他简直说成魔鬼，后来写文章、写书，又把他吹得白玉无瑕，圣人一般。戚认为，田家英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也不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实际上，应该说田家英是一个有缺点、有错误，但又很有思想，有能力，才华横溢的十分难得的中共高级干部。

行文至此，我们小结一下。

（一）从王力和戚本禹的说法中，可以看到，关于田家英之死，他们二人所说的情节基本是一致的。有所差异，无关宏旨。事实只有一个。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胡乔木说的符合事实，还是王力、戚本禹说的符合事实？当然，我说的符合事实，是说基本上符合事实，谁也不能肯定人们事后的回忆完全准确。事实上，已有人指出：“戚本禹的大部分叙述是可信的，但也有小部分记忆不够准确。”（2011年9月6日王凡给我的信）我相信，通过本文提供的材料，关于田家英之死的真实情况，人们会做出比较客观和公正的判断。

（二）从王力的说法中我们看到，他直接和明白地说，在田家英之死问题上胡乔木的说法“完全违背事实”。既然在10年前（2001年是出书的时间，实际王力所写时间应该更早）王力就指出了这件事情，而现在出版的书谈到这个问题时，根本不顾王力的指正，对此不置一词（就是批驳也好嘛），径直照抄胡乔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说法，这不应是历史工作者和研究者之所为。

（三）在1966年5月处理田家英问题时，本来负责人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王力、戚本禹是跟着去的，只是成员或随员，胡乔木却说成“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根本不提安子文，这是为什么？这种做法同“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精神相距岂能以道里计？

◇ 他为什么自杀

上面所讲主要是田家英自杀的过程和情况，至于为什么自杀，谈的似乎还非常表面，没有触及实质。胡乔木说田自杀是因为“忍受不了诬陷和侮辱”，这是一句空洞的话头；我们看到安子文和田家英谈话，只是说中央认为他犯了严重错误，要他停职检讨，并没有什么“诬陷”和“侮辱”的语言。所以田家英究竟为什么自杀，还需进一步探讨。

在一次会议上，遇到田家英的朋友李锐老人，因他耳聋，我大着嗓子问他：“李老，请问您：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李锐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毛主席不要他了嘛！”除此他再也没说什么。

2008年冬，戚本禹因事来京，我和他也讨论过这一问题。他说田家英自杀除了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外，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他觉得没希望了——我觉得戚本禹说的和李锐说的是差不多的意思。

2004年10月30日，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曾约请田家英的女儿曾自回忆她父亲田家英，曾在谈到父亲的死时是这样说的：

父亲最后的遗言：“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我觉得父亲有一种极大的失望，他追求的事业，他一生献给主席的热爱，觉得主席最后把他否定了。我认为这是他结束自己的最主要的原因。他如果觉得主席把他抛弃了，他就觉得没有希望了。他觉得主席对他形成概念了，把他划成敌人了。

文史学者王凡在给我的来信中，谈到田家英的死因，说：“我觉得是多重的，当然毛泽东的不信任和把他划到自己以外的阵营，是最重要的原因，这等于宣布了他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他清楚这个‘宣布’的结果，（他住的）永福堂的前一位居者是彭德怀。”（这与戚本禹说法同，这二人都是在中南海工作和生活过的人，说的可信；《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书中说田家英住“喜福堂”，不对，或许是笔误——笔者注）

我问戚本禹，毛泽东为什么不信任和抛弃给他当了将近20年秘书的田家英呢？他明确回答：这主要是田家英和刘少奇的关系。他说，毛泽东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田是主席办公厅副主任，当毛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换上刘少奇时，田没有辞去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而继续留任。田给刘少奇打电话，询问应怎样工作，刘说：你过去怎么做还怎么做。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田和刘少奇都主张“包产到户”。田家英把这种主张向主席报告，主席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主席认为他说的不是实话。

在这次和戚本禹见面时，他还说了一个情况：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次中间休息时，总理跟我说，主席意见，要你接替田家英中办秘书室的工作。我诚恳地跟总理说，我事情挺多，忙不过来，再说我的能力，怕胜任不了。总理亲切和蔼地说，这个问题中央已经定了，至于工作会有人帮助你的。

戚本禹说：后来我确实代替田家英负责中办秘书室的工作，主要为毛主席服务。我担任这个工作之后，江青有一次和我谈话，郑重地告诫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不能“结交诸侯”这句话。我觉得田家英栽就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结交诸侯”，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书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条戒律。

听到这些话，不禁想到笔者给江青做秘书时，她第一次谈话的内容，现在看来也含有这个意思。她说：“……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之外，你不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人布置的工作和任务，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向你布置什么工作和任务，这是党的纪律，你要对党负责，对我负责……”

若问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只能说这是一种政治——一种我们一般人还不怎么了解和懂得的政治。

□ 原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

~~~~~

# 【亲历者言】

## 我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 艾 玲 • 洪小文 •

洪小文按：《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刊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一文，里面提到“《文汇报》为此印的白头《文汇报情况》，由张春桥直送江青，报给毛泽东。负责搜集情况的是《文汇报》北京记者站的负责人艾玲。为此张春桥还讲过，艾玲对批《海瑞罢官》是有功的。所以‘文革’中张春桥保过艾玲”。艾玲是1936年在广州参加革命，1939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从1958年至“文革”初期，一直担任上海《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2007年3月7日在广州病逝。2006年3—4月间，艾玲曾向笔者口述过她在“文革”期间的经历，现将整理文字摘录如下。

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上海《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当时习惯简称“北办”，下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采访、收集北京理论学术、文艺及教育界的动态和意见，汇总报给在上海的报社，供市领导参考。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在前一天，《文汇报》副总编辑陆灏给我打电话告之：“明天将要发表一篇大的文章，是一个叫姚文元的写的，你们‘北办’在文章见报后就出动，收集一下有关人士对此文的反映，”还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上海市委让《文汇报》刊登的，但对外不能说，只能说是姚文元向《文汇报》投的稿……”。

该文见报后，“北办”即出动人员采访了有关部委和领导。我和记者李根第去采访了吴晗。吴晗对姚的文章很生气，说《海瑞罢官》不是他要写的，是毛主席叫写的。《人民日报》的同志

普遍反映是不同意姚的文章，王若水就向我表示很反感。李希凡说，江青原来叫他写这篇文章，他表示自己是搞《红楼梦》研究的，对海瑞了解不多，江青就说那让别人来写。

我熟悉的一些老领导、老同志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在对待批判《海瑞罢官》究竟是“学术研究”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的问题上，观点认识不尽相同。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赞同批判《海瑞罢官》的是左派，不赞同的是右派”。对社会上的反映，我们没有把它看得很严重，因为当时中央并未有任何文件明确表态。“北办”在正常的工作职能范围内，把这些情况反映汇总上报给上海《文汇报》编辑部。至于编辑部把“北办”上报的情况如何处理，是以《文汇报情况》还是以《记者简报》形式上报上海市委，我和“北办”是不知道的，也不会去打听。那时，“北办”每天都有一个邮包装上我们手写的情况汇报，通过民航班机送往上海。报社有什么文件也通过这个邮包给“北办”。后来听说，毛泽东、江青在上海很重视“北办”的汇报，每天就等着邮包一到就取去看，了解北京的情况。报社领导对我说：“北办”的工作是得到肯定的，是在为党工作，你们采访的情况，毛主席都看过了。为此，“北办”上上下下都感到很荣幸。

当时，“北办”负责与《红旗》杂志联系的记者是李根第，我在他采写的情况汇报中，发现关锋、戚本禹，还有学部的尹达，是支持姚文元文章的少数几个人，就把他们的观点编入了给上海的报告之中。一天，陆灏电话通知我，设法把关锋、戚本禹二人秘密安排到上海。行动要绝对保密，不能让中宣部知道，也不能让“北办”的其他人知道，总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亲自通知了关、戚二人后，关锋就向《红旗》杂志社假称父亲病重，要请假回老家；戚本禹也向单位请了假。为了掩人耳目，我不能用“北办”的车，又不便借用其他单位的车。想来想去，只好向在军委机关工作的丈夫求助，请他派部队的车子送关、戚两人去机场。那时正值冬天，我在半夜出发，乘坐军车悄悄开到关、戚家的附近等候。由于怕被人看见，还不敢直接开到他们的家门口。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关、戚二人分别来到与我接上头，就直奔首都机场。他们乘第一趟飞往上海的航班离开了北京。我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任务。事后，陆灏还表扬我这件事办得好，干净利落。当时，关、戚两人去上海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陆灏会去接机。后来，听说关、戚二人在上海见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还参加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会。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关、戚都是小组成员，成了红极一时的中央首长。

1966年6月，《文汇报》社内部开始贴大字报，批判报社领导。不久，我和“北办”的主要工作人员被责令返回上海参加报社的运动。我与编委其他成员一起被大字报点名，戴上了“走资派”、“资产阶级黑线人物”的帽子。大字报铺天盖地，就连我那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宿舍，从四面墙壁到天花板，甚至小小的单人床头、床侧都贴满了大字报，折磨得人寝食难安。我被揪斗时，人群鼎沸，口号声喊个不停。1966年11月8日，我和报社几个编委被正式宣布停职接受审查。

经过九个月的批斗审查，一天，造反派副司令来找我，说关锋、戚本禹来上海了，要解放你。当时我没有听说张春桥要保我。1967年3月25日，《文汇报》革命委员会成立，我作为老干部结合进领导班子，担任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又当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不久，我感到与造反派很难合作，而且家又在北京，自己仍兼任“北办”主任，于是又回到了北京。报社的实际工作由邵传烈等人负责。

1968年7月1日晚，我代表“北办”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庆祝中共成立47周年文艺晚会，主要节目是钢琴伴唱《红灯记》。我进入会场刚在后排坐下，就听到广播里喊：“京办的艾玲同志请到前面来。”我听成是“军办”的，就坐着没有动。一会儿，一个男同志（后来知道是江青的秘书）来找到我，说叫你到前面去怎么还不走？我说是叫军办的，不是我。他说，就是叫你，快走吧！我跟着他到了前排，江青见了我就跟我握手，说“谢谢你了，艾玲同志。”接着



把我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说：“辛苦了，艾玲同志。”这时，周恩来也过来跟我打招呼。我想应该是“北办”的情况汇报，中央领导都看过了，也许还知道曾经由我安排关锋、戚本禹二人到上海，所以才有这么一幕。

1968年11月7日，“北办”奉命停止业务活动，我和“北办”的全体人员通通被调回上海，去上海柴油机厂劳动和调查近一年之久。1969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我是中共“九大”代表，我十分惊讶，自认为不可能。但负责通知的人说是上面指定的，是什么人指定的他也没说。在“九大”期间，我被编在上海知识分子小组，还让我当了副组长（组长是同济大学造反派陈敢峰）。因为我是报社的，陈敢峰就让我负责整理小组讨论的简报。“九大”结束返沪后，我又回到了上海柴油机厂，直到1969年10月，我奉命回报社主持工作。

1970年夏庐山会议后，中央部署批陈整风运动，军队高层与上海帮的关系日益紧张。我当时是不可能了解的，也没有这方面的敏感。1971年1月，在上海召开党代会期间，一次因大会时间长，中午无法赶回报社吃午饭，报社的军代表好意劝我就近到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食堂吃午饭，我便与军代表一起去了。中午，招待所食堂人较多，我们两人还是排队买的饭菜。吃饭时，我们那张小饭桌上，就我和军代表两人，没有第三者。匆匆吃完午饭，又赶回去开党代会了。后来，此事被人传言成我和驻沪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一起吃饭，还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其实我根本不认识王维国。但是，由此捕风捉影说我与空四军挂上了钩，继而竟推论是与林彪集团挂上了钩。于是，张春桥下令将我逮捕。

1971年3月23日午夜12时，徐景贤的秘书到我办公室说：“艾玲和军代表、工宣队代表三人立即去市委开紧急会议。”于是我们即去康平路市委大楼。进到会议厅，只见王洪文、徐景贤紧绷着脸，坐在正中沙发上，四周是挎枪站立的军人。王洪文慢条斯理地说：“你的问题拖了很久了，到现在才解决。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交代和陈伯达的问题。”我当时就抢着说：“我不认识陈伯达”。王洪文凶恶地马上制止我说：“这样吧，你拿些衣服，到个清静的地方去好好考虑交代问题。”我气愤地说：“不去！我没有做错过什么，为什么抓我？我的一些情况，以前曾跟徐景贤谈过，他了解《文汇报》的情况。”我顺势看了一眼徐景贤，希望他能实事求是说几句话。但是徐景贤装着没听见，一声不哼。王洪文讲完话后，对一名军人点头示意了一下。随后过来两个全副武装的军人，一边一个架着我的胳膊，连拉带拽地把我架到门外，推搡着进了一辆早就准备好的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我感到时间过的很慢，当突然听到刺耳的刹车声时，吉普车戛然而止。我被从车上揪了下来，带到一间阴暗且仅够比放下一张单人床略大的小屋子里，便开始强行搜身。看守人员凶巴巴地说：“以后你就叫‘203号’”。我才明白，牢狱苦难降临了。第二天一大早，一支近20人的专案组前来提审，为首的专案组长高声宣读了对我进行专案审查的决定，然后反复逼供我与林彪、陈伯达、王维国的关系。开始每周来几次，以后则半个月、一个月来一次，最后索性半年、一年都几乎不来一次。与此同时，我的老伴受到株连被关押审查，6个子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1975年6月，专案组长拿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的批示：“艾玲顽固不交代，到五七干校边劳动边交代”，命令我去干校。后来报社的同志同情我，给我办了医生证明，说我有肺炎，才免于去干校，也结束了长达4年多的囚禁。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责成上海市委对我被“四人帮”迫害关押问题进行清理审查。审查过程中，对我蒙冤入狱予以平反没有什么障碍，但是对我在“文革”初期的表现和为什么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和中共“九大”代表的问题纠缠了很久。一直到了1979年12月，才给我作平反结论，里面还有一句：“犯了路线错误”。我拒绝在结论上签名。我的回答是：我搞的情况汇报，毛主席也看了，我不同意说那是江青背着毛主席搞的。如果毛主席错了，我就错了！最终，给我做出的正式组织结论删去了“犯了路线错误”那句话，对强

加于我的所有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恢复名誉，予以平反。我于1981年恢复工作，任《中国日报》社编委、社委兼办公室主任。1984年离休，在广州老家定居

（艾玲口述 洪小文整理）

□ 原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

~~~~~

【当事者说】

九一三事件中的直升机现场

• 胡世寿 • 舒云 •

胡世寿：1928年生，安徽无为县黄姑乡人，1941年5月入伍，194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卫戍区副师长、师长，离休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九一三事件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事件，主要是两架飞机外逃，载着林彪等人的三叉戟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另一架直升机被英雄飞行员陈修文迫降在怀柔北部山区。我有幸亲临直升机现场，参与处理了九一三事件中的直升机一案。2011年是九一三事件40周年，我愿意把这一段历史告诉大家。

1971年9月13日早晨5时多，我像往常一样到大操场，准备出操。师长张良友叫住我，让我去执行紧急任务。张师长说刚接到吴忠司令员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的电话，怀柔北部山区上空有一架直升机要迫降，要我们三师立即派人去处理。张师长还交代，机上人员要是活的，不能让他死了；如果死了要看好。对直升机上的东西，如文件、武器要保管好，决不能让空军搞走。

我立即去办公楼打电话，准备通知七团派一个连去现场。这时部队还没有吹起床号，操场上还没有人，我在去办公楼途中碰到司令部坦克科参谋杨景庭。他拿着腰带准备出操，我临时“抓”他跟我去执行任务。我们快走到办公楼时，碰上副参谋长曹玉培，我当即叫他通知七团去一个武装连，紧急到怀柔北部山区。

我和参谋杨景庭什么武器也没有带，就急忙坐上嘎斯69出发了，此时还不到6时。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感觉是大事。我心里非常焦急，也没有去想为什么不能让空军插手，明明是他们的飞机嘛。我命令司机开到80迈。怀柔地区的道路还算平整，只是窄一些，好在清晨没有什么车辆，6时30分我们到达怀柔西边的渤海所。

我们到时直升机已经迫降在时令河的河滩上，这是一块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七团的武装连还没有赶到，直升机现场全是民兵和老百姓，人山人海，也搞不清有多少人，反正直升机周围全是人。怀柔山区解放前是革命老区，老百姓警惕性都很高。而且他们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正是起床时间，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拿着锄头、铁锹、棍子，大声喊叫着抓特务。他们七嘴八舌说，直升机是早晨4、5时来的，然后降落的，声音非常大，而且直升机在空中抖动不止。

我们到达现场时，我看见直升机上有一个飞行员（陈修文）歪倒在驾驶舱里，又查看了附近玉米地有两具死尸（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和处长于新野）。我问村干部有没有活人。众人七嘴八舌地说：有两个活人，一个到了沙峪，一个在渤海所。

我把现场交给民兵看守，嘱咐任何人都不能靠近直升机。然后我去了沙峪。在大队部我看到一个穿空军服装的人（李伟信），正在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报告他们迫降在怀柔山区。我们只是执行具体任务，没有对犯人提审的权力，我简单问了他几句。他说他叫李伟信，是空军四军秘书处长，在林立果身边工作。李伟信还说吴法宪搞政变，林彪去乌兰巴托求援。这不是天大的玩笑吗？我听了根本不相信，立即命令把李伟信捆起来，关进嘎斯车里，由杨参谋看管，不能让他胡说八道。然后我一人去渤海所大队部，在民兵的帮助下，把另一个活着的飞行员陈士印也捆了起来。

这时，七团副团长王德胜带五连两个排赶来了，真是及时雨！我非常高兴，首先向王副团长宣布事故性质严重，你们任务也非常重，首先把两个犯人看管起来，不能让他们自杀，也不能让他们跑了，更不能被空军抢走。如果犯人逃跑，只能打断他的腿，决不能打死。

接着我派部队切断渤海所至怀柔的公路，切断沙峪至九渡河公路，防止沙河机场的空军来抢文件和武器。然后我迅速回到直升机现场，向老百姓宣布：事情性质很严重，请大家远离，不要靠近直升机，保护好现场。

这时，怀柔县革委会主任张满、副主任杨某某、怀柔县公安局局长李军、怀柔武装部部长朱兆林、七团团团长张前进都来到现场，我召集所有在场的领导干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虽说我对事情也并不清楚，但总比他们多知道一些。我说：一、事件是严重的，属于什么性质尚不清楚，但涉及国家机密；二、请召集大队干部，动员群众回去搞生产；三、不要传播谣言。这件事情关系国家大事，谁传谣就是造谣惑众的问题。现场由七团五连看管，别人都离开，决不能出任何问题。

我同时向在场的公安部、市公安局、怀柔县公安局的干部，包括法医、记者宣布：此次事件有关大局，是机密大事，问题尚不清楚，第一不得外泄，第二请将拍摄的胶卷交出来，待问题弄清楚了再还给你们，或者自己曝光。目前我们对总的情况没有接到上级通报，北京卫戍区规定我们执行具体任务，其他无可奉告。这是国家大事，请予合作。大家不要在现场停留，都请立即回去吧。

9 时左右，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刚来到渤海所，我向他报告了直升机迫降的大致情况，已出现的问题和处理情况。李副司令员指示开设指挥所，对现场出现的新情况要及时上报。我立即将大队的电话调用，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通信处与北京市电话局、中南海电话局协调，将人民大会堂至渤海所的电话调为专线，沿途支线停止使用，保障司令员吴忠与渤海所的通信畅通无阻。

这时，总政保卫部部长徐海涛坐着奔驰车来了，说是总政主任李德生要他来了解一下情况。根据人民大会堂电话的指示精神，我告诉他，我们是看管犯人，保护好现场，没有提审犯人的权利，无情况奉告。你要看可以隔 200 米，远距离观看，不可以进到现场。这位徐部长看了看外部情况，提出要回去。我让五连副连长李友清把他送到团部休息，要团长热情接待，实际上把他“软禁”起来。因为在那么复杂的情况下，搞不清这位保卫部徐部长是真是假。

空军沙河机场警卫连连长带全副武装的一个班来了，说要了解直升机的情况。我问他知道是什么事故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一、你不知道是什么事故；二、这个地区属于北京卫戍区的防区，友邻部队全副武装来，要事先联系或得到有关部门通知方可进入；三、你们莫名其妙来是不符合规定的，待我报告后再说。

因为师长已经交代不能让空军介入，虽然搞不清为什么，但我对空军方面来的人格外注意。

我让这个班的空军把武器放下，其中一名空军战士说他枪里有子弹。我当即命令他们向后转，退子弹，枪放下，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这时部队还没有到，事后想真是有点冒险。正好七团卫生队军医马志军带救护车来到现场，我大声叫马军医把这个班送到你们营房，要团里安排他们休息吃饭。实际上也是把他们“软禁”起来了。

11时左右，空军驻怀柔导弹某师政委带着陈参谋长来了，要进现场，被我劝阻。我把他们让到生产大队的一间空房里，屋子里没有椅子，大家都站着。我问他们奉谁的命令。他们说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的指示，让他们了解现场情况。我又问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事故吗？他们说不知道。我说既然不知道，请两位坐下休息。他们提出要回去，我说不要急，待我报告人民大会堂，得到指示后再作安排（舒云按：其实他们坐吉普车来的途中与怀柔武装部部长朱兆林相遇，朱部长简单介绍了情况，他们也看了两具尸体的现场，只是他们进直升机现场被拦）。过了20分钟，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指示，现场由北京卫戍区处理，让他们回去工作。

11时左右，北京电话指示，派两名得力干部把两名活犯人安全押送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交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政委杨俊生。我将七团团张前进、怀柔武装部部长朱兆林请来，交代他们两人每人押送一人，直接送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二楼，交给吴、杨两位首长。我说：你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中途不能停车，不能让空军把人抢走；第二、要绝对保证安全，如果犯人逃跑，可以打断腿，决不能打死，一定要把活人送到卫戍区；第三、送到后你们直接回部队，掌握部队，做好战备工作。

安排完这一切，到了午饭时间。我又渴又饿，才想起来还没有吃早饭，更不要说午饭了。我要七团副团长王德胜到沙峪警卫点（仓库）三机连送点饭。直到下午2时炒饭送来了，我才和李刚副司令员等吃了一顿饱饭。约下午3、4时，人民大会堂来电话指示，当晚把三个死者送到警卫二师医院的太平间。于是我决定用七团卫生队的救护车，由五连派三个人，随军医押车。

我指挥九连连长李金虎上直升机，将飞行员陈修文的遗体从驾驶室搬下来。直升机的机身上有个用盖板盖住的脚蹬，一伸脚就能打开，可是我们都没有上过直升机，不知道怎么上去，最后只好搭人梯上去，费了很大劲才把陈修文的遗体搬下来。驾驶舱地上血很多，都流到后舱了。

然后我指挥清查直升机上的文件、武器等物品。我们强行打开后舱门，里面有三支冲锋枪，两支手枪，以及部分子弹。还有一大皮箱机密文件和军事地图，标有全国军队部署等。这中间还出了一个笑话。我们发现一部录音机，那个年代根本没有见过什么录音机，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大家乱拨乱按，结果弄响了。以后知道是黄永胜、叶群谈乌七八糟的私生活，据说是林立果录的，目的是为了黄永胜交权的证据。李刚副司令员急忙叫关起来，可是谁也不会关录音机，老是在响。最后有人试图用急救包的绑带把它绑起来，无意中碰到开关，这才不再响了。

处理完直升机，我和五连战士清理现场周围。在不远的玉米地里发现一地碎纸片，红铅笔写的白色纸。我命令全部捡回，用信封装好，一并呈送北京卫戍区领导。

中央处理慎之又慎。专家拼凑字块时发现少了一个“月”字，要求找回。9月14日上午我带五连一排再去现场找，不巧9月13日夜里下了雨，增加了寻找的难度。我们采取拉网式，反复几趟，才终于在泥地里找到了一小块湿纸片，如获至宝，“月”字找到了（舒云按：为了一个“月”字，如此兴师动众。而更重要的“林彪手令”为何缺失三分之二）。

我体会工作作风要细致，特别是政治事件中任何细小杂物都不能丢掉，否则将误大事。如

果我们第一天20多人在玉米地找遗物，再细一点，就不会丢掉“月”字，专家复原成“黄永生”，给周总理添了麻烦。据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问黄、吴、李、邱，谁认识黄永生，都摇头不答。9月14日下午这个“月”字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和“生”字一对，正是“胜”字。据说黄永胜看后傻了眼，往沙发一倒说“小林彪临死还拉我一把”。

9月13日19时，我把直升机现场交七团副团长王德胜负责指挥，由五连严加看管，不准出任何问题。我随副司令员李刚把收缴的文件和武器弹药装上车，直接去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二楼会议室。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第一书记吴德，中央候补委员、卫戍区司令员吴忠都在等着我们汇报。

副司令员李刚要我汇报，我就从接到电话后，5点半出发，约6点20分渤海所飞机迫降现场，立即将两个活的即李伟信和副大队长陈士印抓获。我简单问几句，李伟信说吴法宪搞政变，林彪等去乌兰巴托求援，我听后又信又不信，但感到事态严重，命令他停止放毒，然后又请怀柔县革委会主任张满等人开会，要他们动员群众回去搞生产，不要散布谣言。后来我又讲了陆续处理公安系统来的人，以及处理沙河机场警卫连长带的全副武装班，空军驻怀柔导弹师政委、参谋长，总政保卫部徐部长等一系列问题。

诸位领导听我汇报后说：你处理现场的情况是对的。然后特别强调：你们没有传达任务，要保密。司令员吴忠对我说：你回去抓部队战备工作。

汇报会议结束已经到晚上10时，李刚副司令员请我到食堂吃晚饭，喝茅台酒。饭后我回到师办公楼，师长、政委和师其他领导都集中在作战室，等着我讲情况。我只说一架直升机出政治事故，北京卫戍区领导要我们抓好战备工作。

当晚我怎么也睡不着，接触到的情况令我震惊。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党章明确写着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犯人李伟信说吴法宪搞政变，林彪去乌兰巴托求援？北京卫戍区领导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究竟是李伟信撒谎，还是确有其事？我搞不清楚。国庆节前传达中央57号文件，我才恍然大悟。不管怎么说，我们面对现实，尊重党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坚决认真积极负责处理新情况就对了。

（胡世寿撰文 舒云整理）

□ 原载《党史博采》2011年第10期

~~~~~

## 【文革一页】

### 文革时期闻名全国的灵宝县“精兵简政”

• 石 耘 •

1966年至1976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运动初期，河南省灵宝县炮制了闻名全国的“精兵简政”典型，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学习灵宝经验的热潮。

#### ◇ 事情的缘起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经全面夺权，至1968年9月西藏、新疆两地

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成立，全国大陆省份全部成立了革委会，此即实现了当时所谓的“祖国山河一片红”。在此前后，全国各基层党政机关，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也都陆续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行使着当时的一切权力。各地、各级革委会的人员构成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组成。毛泽东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有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

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无产阶级造反派及其所代表的广大革命群众，是革委会的基础；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革命领导干部是革委会中的骨干和核心。在革委会的成立过程中，特别强调它不仅要与旧时代剥削阶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截然不同，而且要与“文革”前的“旧机构”划清界限。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指出：“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把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品质和我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融合在一起。”“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实行‘精兵简政’，对旧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实行深刻的改革。像有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开始在做的那样，领导班子小，办事人员少，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防止官僚主义莠草的滋生。这样，就能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就能使革命委员会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充满革命干劲、雷厉风行、精悍有力的战斗指挥部。”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甚至把革委会的建立说成是“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新秩序”。

在这样一些思想指引下，革委会的成立，都非常强调机构的“革命化”和“精兵简政”。如国务院所属部门由原来的79个减少为32个，其中除去划归军委办事组等管辖的13个部门外，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实际上只有19个部门。再如广东省阳山县革委会设有办事、政工、保卫和生产4个组，这4个组下又设了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生产生活服务站等8个站，以代替原县委、县人委及其直属机关94个部、科、局、室。在工厂，如天津市麻纺厂革委会，把原来厂里的14个科室合并成革命、生产和生活3个办公室。

革委会成立过程中，对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大量精简。如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由原来的5000多人减少为600多人，只占原来人员的12%左右；大多数省级革委会成立时，全部工作人员只有150—200人，为原省委、省人委工作人员的二十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江西省兴国县“打破了旧县委、县人委的重叠行政机构”，精简了三分之二的机关工作人员。

革委会成立时，这样简陋的机构设置和这样不切实际的人员精简，在实际工作中根本无法应付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各种各样需要。尤其是对于当时我们这样一个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社会经济生活一切方面的国家来说，这种不适应就更为突出。因此，革委会成立后不久，很快就又开始增设机构，增加工作人员。如武汉市革委会成立不足一年时间，工作人员就由90人剧增到1200多人。当时原有的国务院行政组织法已被抛弃，而革委会成立时中央又没有制定、颁布相应的组织条例，所以各级、各地、各行业的革委会在设置机构时，除了几个大组是参照最先成立的革委会的样板外，在大组之下的机构设置则是各行其是，做法参差不齐，特别是在不得不增设各种办事机构时，更是五花八门、匪夷所思。

当时，省、市级革委会各大组下或是派生出更多的“小组”，或是大组下设“办”，“办”下再设局等。例如，在不少省、市级革委会中，政工组下设文教卫生组、宣传组等；文教卫生组下再分成文艺小组、教育小组、卫生小组等。在县一级革委会，机构设置的差异更大，更不规范。总的来说，各级、各地、各行业刚刚成立起来的革委会，很快就又面临着否定自己“精简机构”的初衷，不得不步入很不规范、很不协调的机构膨胀之路的局面。在此情况下，如何找

到一条既能保持巩固“既得成果”，又能发展创新“精兵简政”的路子，就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造反起家的当权派迫不及待需要在找到一个“精兵简政”的典型和榜样，以便向全国各地加以推广。

#### ◇ 灵宝县“精兵简政”的抛出

正当全国都在探索精兵简政之路、亟需借鉴有关经验之时，河南省灵宝县乘势抛出了“精兵简政”的样板。

1968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推广河北省革委会实行精兵简政的经验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各级革委会都要学习这一先进经验。灵宝县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学习讨论，4月初县革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贯彻中央精神，落实这一工作，参照河北省革委会的做法，征求县里有关方面的意见，结合实际制定了自己的精兵简政方案。经过短暂准备，接着就召开县直机关全体干部动员大会，且同时又是布置精兵简政工作大会，宣布了新的机构设置及其人员分工情况。决定一部分人留机关工作，一部分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部分人到两个水库和一条战备公路工地劳动，且很快就付诸了实施。

6月上旬，县革委会常委、政工组组长王维英找来通讯员毛英豪，说：“咱县学习河北省革委会经验、实行精兵简政近两个月来，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在全国各地、从上到下、各行各业都在宣传精兵简政，咱也应该写篇稿子，把咱县的精兵简政工作也宣传报道一下。”毛英豪按照王维英的要求，在进行了一些调研的基础上，于6月20日写出了报道材料初稿。这时，县革委会主任刘尚修在河南省委党校学习。要宣传灵宝精兵简政这样的大事，必须由县里一把手同意方可报道。王维英便又指派毛英豪到郑州去找刘尚修。刘看了稿子稍作修改后便签字同意，而后毛便把稿子送到了《河南日报》社。

6月25日，《河南日报》头版头条以《灵宝县革命委员会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通栏标题，予以发表，报道介绍了灵宝县的“精兵简政”经验。7月7日下午，新华社河南分社打电话通知灵宝县革委会政工组，让上述经验报道文章的作者到《人民日报》社去一趟，说是有要事相商。王维英接到电话后，就赶紧通知了毛英豪，毛连夜动身乘火车前往北京。当毛赶到《人民日报》社后，受到报社革委会主任鲁瑛的接待。鲁瑛说：“你写的那篇精兵简政的报道，中央领导有指示，让我们加编者按发，是否还需要修改补充？”毛回答：“情况就是那样，不需要再作修改补充。”鲁瑛又简单问了一些情况后，让毛英豪回旅馆听消息。7月9日下午，报社两人到毛英豪所住的延安旅馆，告诉他文章7月11日刊发；同时还要派两名记者，随毛英豪一起赶赴灵宝采访。7月10日，《人民日报》两名社记者和毛英豪一起乘火车来到灵宝进行采访。随后，他们俩的采访文章就陆续见报了。

需要说明的是：《人民日报》社革委会主任鲁瑛所说的中央领导，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主席。在6月底前后的一天，毛泽东在浏览各省的党报时，无意之中翻到了6月25日的《河南日报》，正好看到了头版关于灵宝县精兵简政的报道，于是就来了兴趣，仔细看了报道后说：“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这样好的新闻报道了。这篇报道很好，主要是总结出了精兵简政的‘五好’和不精兵简政的‘五害’。”说完后便作了重要批示：“这个经验值得推广，请《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后来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起草了编者按，并经毛主席亲自修改通过后《人民日报》予以发表。

时势造就了典型，典型很快又被人加以利用。所谓的“灵宝经验”，其核心就是压缩减少机构设置，精简机关工作人员。当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正千方百计地打击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老干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灵宝经验”正迎合了他们的反革

命政治需要，他们借机打击迫害了一大批敢于坚持真理和正义的党政干部以及各行各业忠于党的事业的优秀人才，这是毛泽东批示推广“灵宝经验”时所始料不及的。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组员姚文元等人，对此十分欣赏，指令《人民日报》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一“典型”经验。在他们的操纵下，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特大号黑体字通栏醒目标题、整版篇幅发表了《灵宝县革命委员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报道，并加了长达523个字的编者按语。按语用二号字体且加了双线边框和下画线，按语中特别突出了“精兵简政”4个字，5段按语中用了5次“精兵简政”且都是黑体字，版面的编排设计可谓用心良苦。

文章详细介绍了灵宝县所谓“精兵简政”的做法，通篇充斥着当时的语言——1968年1月3日县革委会成立后，由于受旧思想、旧框框的束缚，改来改去，机构还是搞得很大，设置了“八组两室”，即政宣组、组织组、农村组、内务组、财贸组、工交组、文卫组、统计组和革委会办公室、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近百人。办事推诿扯皮，革命、生产受影响，群众有意见。3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县革委会成员认真学习了这一光辉指示，联系以往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大查了机构庞杂的危害性，大议了“精兵简政”的好处，从大量活的事例和实际工作中总结出了“五害五好”，即机构庞杂的害处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人浮于事、工作推拖，助长官气、增长私心，脱离阶级斗争、脱离实际，容易变成官僚机构、不利于人的思想革命化。“精兵简政”的好处是便于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组织机构精悍有力、有利于培养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能“官”能民、破私立公，能经常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经风雨、见世面，有利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革委会的组织建设，必须走“精兵简政”的道路。机构精简后，把原来的“八组两室”改为四个组：政治工作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办事组，工作人员由原来的近百人减少到30人。机构精简后人少事多怎么办？一是千头万绪抓根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思想挂帅，就能保证一组顶几组用，一人顶几人干。二是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大量问题在基层解决。县革委会一班人相信，时时、事事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就能带领全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把各项工作做好。

《人民日报》在编者按语中说：“灵宝县革命委员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教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朝着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前进了一大步，树立了崭新的革命作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央各工作部门，都要像灵宝县那样，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如果大多数的革命委员会把清理阶级队伍、实行精兵简政这两件工作抓好了，就是从组织上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头条播发了这一重要新闻。至此，灵宝县作为“精兵简政”的典型向全国隆重推出，一时间灵宝名声大噪，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真是红得发紫，出尽了风头。

#### ◇ 灵宝县“精兵简政”的愈演愈烈

《人民日报》把灵宝县作为“精兵简政”的典型向全国推出后，紧接着一批又一批的“经验”文章不断出台，一个又一个的宣传活动不断展开。就在7月11日的当天，河南省革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认真学习讨论了《人民日报》关于“灵宝经验”的报道，深刻领会其重要编者按语的精神。会议号召，全省各级革委会，要积极推广灵宝县革委会的经验，使各级革委会在实现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会议决定，省革委会立即组织学习小



组，奔赴灵宝，学习经验，并帮助他们，使这个经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以促进全省各级革委会领导班子的革命化，从而使各级革委会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中，进一步发挥红色政权的威力。紧接着就派出了以省军区副政委、省革委会常委、政工组组长和解放军代表杜河堤，省革委会政工组所辖组织组组长王纯（系省革委会副主任纪登奎的夫人）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进驻灵宝开展工作，总结经验，树立典型。

《河南日报》7月12日发表社论：《向灵宝学习，走“精兵简政”的道路》，7月13日又在二版整版刊登毛主席有关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语录，以配合促进学习“灵宝经验”。《人民日报》社两名记者随毛英豪赶赴灵宝后，连续召开了几个座谈会，他们又连夜赶写稿子，写成后在灵宝通过邮电局发回北京，7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他们写的报道：《精兵简政，把革委会建成革命化领导班子》——河南省灵宝县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支左解放军代表座谈纪要。7月16日，河南省革委会、省军区在郑州联合召开专题大会，请灵宝县革委会领导汇报介绍“精兵简政”经验。《河南日报》7月21日在二版整版刊登灵宝县革委会主任刘尚修，副主任、军代表刘鸿雁的“经验”文章，7月22日又在四版整版刊登灵宝县革委会实行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照片新闻。7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几乎用整版刊登了两名记者灵宝采访回北京后写的关于灵宝县的“经验”做法的报道：《要勇敢地跳出原来旧机构的圈子》。

此外还有《实行精兵简政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比、学、赶、帮的战场》等一系列“经验”文章纷纷见诸报端。一时，举国上下，舆论大哗，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画报等几乎当时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开足马力予以宣传报道，“灵宝经验”一度成了人们逢会必讲的内容和茶余饭后的谈资。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纷纷组团派人前来灵宝取“经”；“灵宝经验”制造者也不断应邀，前往各地“传经送宝”。1968年的7月，简直成了“灵宝月”。所谓的灵宝县“精兵简政”典型，就这样一步步由人变成了“神”，且不断升温，愈演愈烈。

灵宝所谓的“经验”，原本只是一般的做法而已，同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相比并没有多少创新，充其量不过是报道材料写得好、“经验”总结得好，所以毛泽东才批示向全国推广。但是一旦被树为典型后，情况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县革委会少数几个掌实权者借机大做文章，把那些所谓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加以“精简”，或排挤出领导岗位，或下放农村劳动，或隔离审查批斗，以突出他们工作有“成效”，搞得几乎是人人自危。

灵宝的做法已违背了精兵简政的初衷，脱离实际，纸上谈兵，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是离弦之箭越走越远。他们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贪图更大虚名，则变本加厉地编造谎话，欺骗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于是，在大造舆论、高唱颂歌的同时，县革委会一些负责人还带领机关干部，身背行装，肩扛铁锹，高举着“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走精兵简政的道路”的标语，高呼口号，上街游行，并组织群众夹道欢送。舆论声势造得越大，各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就越多。在最集中的一个时期，每天都有上千人乃至几千人从全国各地慕名来到灵宝，一面面“忠”字旗，一个个“忠”字牌，一场场“忠”字舞，把灵宝县城简直汇成了“忠”字的海洋，好不热闹。

为此，郑州铁路局根据时势需要，特意把郑州至三门峡西的一列客车，向西延长至灵宝车站，使灵宝车站变为终点站和始发站；且使西安至三门峡西的一列客车，路经灵宝车站时延长停车时间，以方便各地的参观者来回乘车；由于来往客人多，郑州铁路局还抽调专门人员组成接待工作组，在灵宝火车站搭起棚屋、负责接待，以搞好服务工作。

与此同时，县里专门成立了接待站，由一名县革委会常委担任站长，负责接待工作；县招待所、县委党校、商业招待所和县直机关食堂都承担接待任务，甚至向许多部门也摊派接待任

务，还远远不能满足接待需要，县里遂又特增设两个招待所，专门接待各地络绎不绝、川流不息前来灵宝的取“经”者。县人民会堂能容纳1000多人，一天到晚有人在会堂负责介绍灵宝“经验”，会堂里常常是座无虚席。开始没有书面宣传材料，外来取“经”的人多了，造“经”的人害怕露出马脚，就事先统一口径，编好假材料，设定专用参观场所，指定可靠专人介绍，下大力气、“实实在在”弄虚作假，沽名钓誉，对灵宝“经验”的学习和宣传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

1969年冬，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纪登奎到灵宝视察工作，对灵宝“精兵简政”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指示灵宝不仅要在精兵简政工作上创造“经验”典型，而且要在其他工作上也要创造“经验”典型，各项工作都要走在前面，全面提升灵宝县的工作水平。灵宝“精兵简政”本是政治上的事情，但又因政治需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被引进到经济、社会和生活学习之中。如广交会，本是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但在1968年秋季（10月）广交会和1969年春（4月）秋两季广交会上的第一个展区，都是介绍灵宝“精兵简政”的情况，向中外客商宣传灵宝；同时，河南省博物馆陈列的第一版块介绍的也是灵宝“精兵简政”的情况，该版块在博物馆内长期展出直到1979年灵宝“经验”被否定后才撤掉，真是做到了经济、社会和生活、学习都为政治需要服务。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全国各地仍有参观者陆续赴灵宝参观学习“经验”。

为了蒙蔽世人，达到长期欺世盗名，县革委会主要领导不但不听来自各方面的正确意见，还以假报道做“盾牌”，打击和迫害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和群众。县供销社一名干部说了句“灵宝县精兵简政是假的”，就被扣上“反对精兵简政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先后批斗达七八个月之久。革委会副主任吴宝善在1969年“八一”军民联欢会上，当众揭露了县革委会某负责人欺骗党中央、欺骗全国人民的卑劣行为，没过几天，便给他罗织了“贪污犯”、“现行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罪名，隔离审查，残酷斗争，最终被迫害致死。县革委会成立前曾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的常宜兴因有不同看法，则被诬陷为“右倾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多次遭到批斗毒打，造成终身残废。程村公社营田大队第五生产队队长张小栓因对当时县里的做法有不同意见，在此蹲点的一位县革命会副主任就说他“煽动群众，反对革委会”、“大刮翻案妖风”，并给他强加上“逼死过人命”的罪名，在公社批判、游斗、毒打两个月后，关进了监狱，他家的房产被没收，父亲被气死，母亲被逼走，弄得家破人亡。为了打击镇压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群众，灵宝县革委会于1968年7月成立了“群众专政小组”，成立后仅仅9个月时间，先后被非法抓起来的干部和群众就达170多人，群众称之为“专政群众小组”、“灵宝的黑监狱”。

就是这样一个人人为地树立起来的“典型”，“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竟又再次把它捧上天。1974年7月，江青、姚文元看到继续吹嘘灵宝“精兵简政”的一个内部材料，便对其在《人民日报》社的心腹说：这“对机关人浮于事是个有力的批判”、“要肯定成绩”、“补台”，并指示派人采访。这个心腹秉承主子的旨意，立即指令记者奔赴灵宝，炮制出《河南省灵宝县坚持精兵简政的新经验》的报道。报道中说，灵宝县“机构精简，人员精干，促使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保持着一个革命化的机关作风”；“在灵宝县，对浮在上面，互相扯皮等官僚主义旧习气，广大干部能自觉地进行斗争”；“灵宝县把大批在职干部下放到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组织成‘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既精简了上层，充实了基层，又使广大干部得到锻炼和改造。”报道中说，“灵宝县委和县革委，共有干部75人，除去28人下放农村外，实际在机关工作的47人。”“总的来说，机构、人员都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少，比1968年精简时多一点，灵宝县级机关仍然是一个比较精干的班子。”

实际上，灵宝当时在机关工作的人员足有百人以上。原来，县委某些负责人在介绍人员编制时，竟将22个常委和机要员、档案员、信访接待员、打字员、司机和勤务员等许多人，以及隶属关系在基层、人在机关办公的几十名干部不计算在内。县委某些负责人为了美化自己，

还向记者提供什么“人员少了，官架子也小了，领导干部自己打电话，自己写简报，自己作总结，开会提水倒茶，既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会议的服务员。”《人民日报》同日还发表《坚持精兵简政》的短评，对“灵宝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各地又一次掀起了学习热潮。实际上恰恰相反，当时，灵宝县委书记在县委招待所一个独院养病，80多个床位，不准安排客人，并有民兵小分队守护，长达49天之久。他家只有5口人，专门修了“书记院”，设有第一、第二会客室，分别建有冬夏伙房，还为养狗修了“住房”、“瞭望台”。群众气愤地说：“书记住房真排场，鸡狗也住砖瓦房。”几年来，灵宝县的某些负责人，仅在县招待所大肆吃喝，就挥霍浪费掉3万多元，粮食1万多斤。这在当时是十分惊人的数字。

#### ◇ 灵宝县“精兵简政”假典型被戳穿

粉碎“四人帮”后，灵宝县“精兵简政”的真实面目终于浮出水面。1979年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陈乔炎、石德连、翟启运对灵宝“精兵简政”典型重新调查后撰写的报道文章，以《戳穿一个假典型——河南灵宝县精兵简政的调查》为题对事件作了澄清，并加了编者按：“1968年7月11日，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曾以整版篇幅，吹捧灵宝县精兵简政的假经验，引起灵宝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最近本报记者重新作了调查，证实灵宝‘经验’是假的，应该拨乱反正。”该报道中说：“大量的事实说明：灵宝县所谓精兵简政的经验，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典型。”

事情的真相是：1968年灵宝县革委会成立后，并没有真正搞什么“精兵简政”，但县革委某些负责人为了迎合时势需要、捞取政治资本，便炮制了所谓“精兵简政”的经验，在《河南日报》上率先予以报道，旋即《人民日报》非但转发该文，而且加了极其重要的编者按语，骤然之间使灵宝“经验”一下子轰动了全国，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一浪高过一浪，实则“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迫于上下的压力和县内外的舆论，县革委某些负责人这才慌了手脚，匆匆忙忙着手“精简机构，下放人员”。

报道中说，新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由原来的近百人减少到30人（包括解放军代表12人）”。事实上，在册发工资的人员是：1968年6月份154人，7月份150人，8月份150人。从精兵简政“经验”发表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县革委会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减少到30人。报道中说，灵宝县革委会是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实际上当时县革委会的50多名成员中，搞打砸抢起家 and 道德败坏者就有20多人，这是前所未有的领导机构严重的组织不纯。报道中说“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实际上他们是借机打击迫害了一批革命干部和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同志。报道中说“下去的干部隶属关系不变，职务不变，与留机关的干部实行轮换，一年换一批，三五年换完”，实际上是不少干部被下放到生产队当社员，隶属关系和职务都变了，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分配了适当的工作。

县革委会某些领导，他们经常宣扬自己能官能民，带头劳动，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实际上他们工作靠秘书，出门坐汽车，生活图享受，心里没群众。他们靠灵宝“经验”这块“金字招牌”为自己捞取了不少好处。如县革委会一名副主任当上了中共“九大”代表，出席了大会并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随后又当上了县革委会主任，极尽荣华。县革委会另一名副主任长期身居要职，从副主任中的较后位次升坐第二把交椅；同时，另有一些人也分别升了官。随之，他们的谎言也就越撒越大。于是，《精兵简政，把革委会建成革命化领导班子》、《他们是群众的贴心人》等几十篇假报道连续出现了，流毒甚广，影响极坏。

全国各地、各级革委会借学习灵宝“经验”之名，又进行了一次“精兵简政”运动，大批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专家乃至国营工厂工人被下放到山区、农村和基层，从事体力劳动。这种做法不但难以达到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目的，反而在许多地方、行业、部门和单位成为迫害

干部、惩罚知识分子、反对科学研究、不准钻研业务的手段，产生了带有破坏性的后果，给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灵宝县一些领导弄虚作假，还不许别人揭发，谁要说灵宝“精兵简政”是假的，就给谁扣上“破坏精兵简政”、“反对红色政权”、“现行反革命”等大帽子，轻则批判斗争，下放劳动；重则隔离审查，百般摧残，以至迫害致死。他们以“精兵简政”为幌子，极力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组织路线，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排斥异己，打击革命老干部和所谓“站错队”的同志。“文化大革命”前的县委常委12人，有9人被打成“叛徒”、“走资派”、“三反分子”、“右倾复辟势力的代表”等，戴帽下放，劳动改造；全县16个公社的正副书记和县直30多个单位的科局长以上干部168人，先后有100人被排挤、批斗、撤职和劳改。人员不够用，就大搞“双突”（即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网络帮派势力。从1969年至文革结束，全县突击发展党员3698人，其中仅1976年6月16日至24日，8天时间中就突击发展党员731名；县、社两级突击提干519人。县委常委22人中，“双突”就有16人，占72.7%；全县副局级以上干部211人中，“双突”就有113人，占53.6%。事实说明，像灵宝县这样的“精兵简政”，不仅没有什么积极成果，而且只能是劳民伤财、付出巨大代价和造成沉痛教训后仍在精简——膨胀——精简的老路上循环。

粉碎“四人帮”后，这个欺骗人们达十多年之久的所谓灵宝“经验”终于得到了澄清。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反面教材。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

□ 原载《文史精华》2011年8月

~~~~~

【史海钩沉】

江青借纪录片《中国》挑起政治风波

• 丁 东 •

在“文革”中，意大利是与中国建交较早的西方国家，时为1970年11月5日。次年，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函，希望拍摄一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由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执导。中国当时也希望打破封锁，展示自己。于是，外交部和国务院文化组委托驻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参赞正式发出邀请。

1972年5月13日，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由弗利奥·哥伦布领队的安东尼奥尼摄制组到达中国。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林县等地拍摄了22天，完成了一部4个小时的纪录片《中国》。1973年1月，该片在罗马首映。因为这是“文革”以来西方人第一次进入中国大陆拍摄，导演知名度又高，此片反响很大。美国广播公司花25万美元，购进这部影片在美国的公开放映权。当时，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部纪录片，引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政治风波。

1973年5月17日，周恩来会见了美籍科学家杨振宁。杨振宁说，我不知道周总理是否认识安东尼奥尼，他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导演，去年到中国访问了很久，后来又拍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没看过，后来，我看了一个比较左倾的小报纸，上面有一个中国学生的分析，我觉得很深入。这个人大可能是个学电影艺术的，他说，这个电影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如果你对安东尼奥尼过去的电影手法有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恶毒地攻击中国。

周恩来不认识安东尼奥尼，也不知道他来华拍摄的情况，他要工作人员查一查，但在场的记录人员对周恩来的吩咐并没有记录下来。然而，杨振宁的话还是传到了相关机构。

当年12月11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有人就电影《中国》给江青和姚文元写信，姚文元立即批示：“转中组部业务组调查后写一报告。”17日，此人又写信说：“意所谓《中国》长片，是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立场观点上，极恶毒地诬蔑我国的反动影片，整个影片通篇把我国描写成贫穷、落后、愚昧、灰暗的样子，完全歪曲了我们伟大中国的形象，令人非常气愤。此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放映后，对我国影响极坏。为此，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给周总理来信，反映此片很坏。”姚文元再批示：“建议文化组调看影片，并会同中组部彻查此事，共同提出处理意见。”江青批示：“应严肃认真对待，并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12月30日晚，在北京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调看了《中国》。1974年1月9日晚上，江青在国务院文化组的会议上说：“你们给意大利人搞的那个坏片子，我看了很生气，奇怪的是那样的坏人，是我们自己人请来的。”1月16日，江青再让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看《中国》，并点到驻意大利使馆，说：“这个大使要撤！”

周恩来感到被动，调来了广播局关于《中国》的拍摄档案，发现自己与杨振宁谈话要求查查的指示没有被记录。于是叫秘书摘抄了他与杨振宁谈话的有关部分，并在前面写道：“我因不识此人，不知此事，故告当时参加谈话者查查，记录非熟手，未记入。供中组部查核此事时参考。”

由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挂帅的联合调查组，于1974年1月30日向中央提交报告，将此事说成外交工作的右倾投降主义。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沈平被召回国，进了学习班。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新闻司司长彭华也被批判，做检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此后，批判文章连篇累牍，持续了一年多。直到江青倒台两年多以后，197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才转发了外交部的报告《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给这场风波画上了休止符。

最近，我重新观看了这部纪录片，感觉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百姓的衣、食、住、行、文体生活和精神面貌。比起中国自己拍摄的新闻简报，保存了更多的历史信息。虽然导演是在颇受约束的条件下拍摄的，但叙述心态相对平和。他们不肯按照中方的基调刻意美化，但也没有刻意丑化。有一些温和的议论和批评，只是出于价值观的差异，而非出于恶意。但当时中国处在唯我独尊的心态中，只希望听到来自外界的赞美，于是，并不反华的安东尼奥尼，被打成了“反华小丑”。

□ 原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18期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